

日本应承担侵略亚洲战争的责任

——日本侵略亚洲战争责任问题国际讨论会侧记

□ 本刊特约记者 彭善民 孙爱民

2003年9月18日至9月20日,由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发起、上海师范大学主办,上海史学会、《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协办的“日本侵略亚洲战争责任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师范大学顺利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专业学术研究者、日本侵略亚洲战争受害者、律师等各个方面的人士,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韩国、美国、日本、菲律宾、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20余人及海内外30多家媒体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慰安妇”、强制劳工、细菌战、毒气战及遗留毒气弹处理、战争赔偿等问题,鲜明的主张和强烈的愿望,使得会议讨论非常热烈。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追究日本战争责任方面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但在如何做的问题上仍有不同意见。以下几个方面是会议讨论的焦点。

慰安妇的血泪控诉

中国大陆的陈金玉、中国台湾地区的林沈中、韩国的李容洙、菲律宾的Mr.Lola Beatni Tuazon等分别就自己所遭受的性奴役经历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进行了控诉,她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对战争负责,认罪并赔偿。原海南“慰安妇”幸存者陈金玉这样叙述自己的苦难经历:“我叫陈金玉,生于海南省保亭县,黎族人。被日本兵糟蹋的那一年,还是一个才16岁的孩子。

1939年日军进攻保亭县,并不断强抓当地村民作为劳工为日军修路架桥。1941年初,我被日本兵抓住,编入日本人的‘战地后勤服务队’。被编成‘战地后勤服务队’的姑娘,白天被迫为日本人干活,晚上则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作为一个孩子的我,痛苦的感受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到现在我身体还经常忍受着那时候遗留下来的疾病的痛苦。现在我一个人生活,日子过得很苦,我恨日本人。”

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5年来的调查,海南岛有23人已确认曾经是日本军队的“慰安妇”,目前健在的只有18人。王玉凤老人作为日军“慰安妇”,难以回忆那痛苦的岁月,多次拒绝调查人员的采访。还有陈金仪老人,每当提及此事,总是以泪水和痛苦面对过去那悲惨岁月。与海南“慰安妇”一样有苦难经历的中国台湾地区老人林沈中,一生中受到极大的伤害,结过4次婚,离了3次,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每一任丈夫都无法忍受我过去曾做‘慰安妇’的这个事实”。

1991年12月韩国原“慰安妇”金学顺等3名战争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及日本军人提出赔偿请求,拉开了全世界原“慰安妇”向日本追讨战争责任的序幕。之后,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朝鲜、韩国、菲律宾、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原日军性奴役受害者,不断向日本提起诉讼,但结果不是日本法院不予受理就是败诉。这反映了日本在对待战争责任问题的处理上,还企图尽量逃避战争责任。但是,原“慰安妇”受害者不断的上诉和与日本政府坚决斗争的决心,已

引起了各国人民的关注和支持,也得到了来自日本国内人民的支持。迫于压力,日本政府近年才开始重视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日本参议院2001年3月21日提案审议《促进解决战时性强迫受害者问题法律案》,首次承认了日军对亚洲国家女性受害者实施的“战时性强迫”。所谓“战时性强迫”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前发生的一系列事变中,在旧陆海军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下,违反女性之意愿对其进行征召,有组织地、持续地强迫其为性行为”。该决议在2001年11月14日、2003年1月31日、2003年7月28日经过多次审议,但是,在现实事件中对原“慰安妇”问题的处理上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有很多“慰安妇”已风烛残年,她们能否在有生之年看到胜诉的结果而得到心灵的安慰还是一个未知数。为此,加紧“慰安妇”问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促使日本政府早日作出赔偿已迫在眉睫。本次会议上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提出,对受害“慰安妇”实施“幸存慰安妇晚年身心照顾计划”。中国台湾地区成立的“阿嬷心理治疗工作坊”,就是为身心受创甚深的“慰安妇”所设计的一个治疗团体,已经工作了四年。经由心理咨询师、心理医师及瑜珈老师们,针对阿嬷过去的伤痛,及当前身心所遭遇的困境所作的治疗,效果很明显。整合她们悲伤之心路历程,帮助她们走出阴影,重新塑造人生态度。

毒气危害还要持续多久

这次会议有来自湖南的代表对湖南

常德细菌战及其毒害情况进行介绍、来自云南保山的代表介绍滇西大战及日寇在滇西烧杀奸淫、投放细菌弹的罪行。湖南常德在1941年11月和1943年11月两次遭遇日军细菌战,受害人达7693人之多。许多村庄因为受细菌侵害而无活口,惨痛之极。在云南保山,日军派特务、汉奸混在逃难的人群中,在饮水中投放霍乱病菌、用飞机投放细菌弹、用人体进行活体实验、在滇西散布鼠疫等,受害程度极深,其中因霍乱病菌而死的云南省人就有18万,仅保山就有5、6万人。鼠疫的危害更是延续至1950年前后,约有5万多滇西百姓死于鼠疫。

从1950年到1987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先后发生了四起毒气弹伤害事件,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1950年8月,齐齐哈尔建筑工地发现毒气弹,黑龙江师范大学化学教师在调查中受感染。1976年5月,黑龙江省拜泉县农民被毒气弹感染。1980年4月,黑龙江省依兰县毒气炸弹爆炸伤人。1987年10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筑工地发现毒气罐,作业人员和大夫被毒气感染。日本政府及日本法院在对待此类事件的处理上,完全逃避战争责任和赔偿责任,令世人愤怒。日本国在1995年批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国在1997年批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按照国际公约,日本必须履行处理中国国内遗弃化学武器的义务。但是,实际上日本在处理战争遗弃毒气弹问题上,并没有认真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在对因毒气弹受伤害者的赔偿方面,受害者没有得到日本方面令人满意的答案。

刚刚发生的“8·4”齐齐哈尔毒气弹事件,就解决毒气弹事件而言,对中日双方都是一个良好机遇。可以利用此次事件扩大影响,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敦促日本充分按照中日协议的规定,解决中国内陆地区遗留的毒气弹危害问题。日本政府可以就此次毒气中毒事件给中国人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害的机会,认真反思战争责任问题,进一步处理好日本侵略中国遗留毒气弹问题。但遗憾的是日本政府没有认真去做。日本政府图谋派遣调查团来隐瞒事实真相,隐瞒与毒气弹有关的相关信息,甚至在治疗方法上不给中国方面以最新技术指导,为了经济利益而不向中国提供最先进的毒气医疗技术设备。连日本代表也指出日本政府的这种错误做法,以回避性的表达方式,就是常用‘遗憾’代替‘谢罪’,它暴露了日本独有的体制上的弱点。从这件事也可

看出,这种带有政治性的歪曲和回避事实的做法,只会唤起受害者和受害国愤怒之情,等于罪上加罪。日本政府应该尽早拿出勇气选择谢罪的措辞并作出必要的补偿。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也是日本政府进行危机管理,重塑国家形象的最好机会。

苦难劳工心声

与会的受害劳工代表有11人,现为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退休教授凤仪萍先生在会上以个人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国劳工的深重苦难。那是1944年,他还是14岁,在上海被日兵抓进吴淞的一个集中营,以后与另外300名青壮年上船,被押运到北海道夕张栗山町角田煤矿挖煤。白天早上4、5点钟下去挖煤,一直干到晚上11点,合格完成才可下班。劳动强度很大,挖煤的时候,趴在地上,煤屑直插到肉里,出来时,眼睛头发脸上全是煤屑,连痰都是黑色。十年后他吐的痰还有黑色的煤屑。住的是木板房,睡的是五公分的木板铺,只给一条很薄的毯子和一套帆布工作服,冷了就把毯子卷起来绑在身上去劳动,晚上回来当被子盖。吃的很少,1两饭都不到,肚子里一天到晚都是空的。从不洗澡,身上满是虱子、跳蚤、臭虫。劳工稍有不从,就会受到残酷的惩罚。他曾在一次反抗中,中指被砍了一截,到现在还隐隐作痛。对他们来说,死亡是很自然的。他目睹了许多劳工死亡,在井下劳动时,一不注意,监工的十字镐就把劳工的脑袋敲开了花。有人想逃,结果被抓回来活活打死。仅仅1年时间,他的同事被打死、病死、饿死以及自杀的高达98人。凤仪萍1945年被救出,幸免于难。他说,过去的劳工生涯造成了他一生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最后凤仪萍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本政府应向德国学习,向中国人民赔礼谢罪,必须承认抓劳工是错误的;二、不能再参拜靖国神社;三、真诚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赔偿。他的要求是代表了广大劳工们的共同心声。

本次劳工问题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花冈劳工和解案。比较温和的学者认为,花冈和解是劳工索赔案中为数不多的没有败诉的案件之一,还算相对成功的一个例子。但是一些当事人的理解与之大有区别,“花冈暴动”领袖、原告耿淳老人专门给大会打来电话说:花冈和解完全是受日本蒙骗,自己在“和解”之前未看到《和解条款》,他认为

《和解条款》的签订是对中国人的侮辱。日本区区5亿日元的支付不是真正的赔偿,而只不过是一种慈善做法,因此坚决反对和解,拒绝接受。不过,老人对日本律师所做的努力还是表示了感谢。中方几位律师代表也都一致表示花冈和解里没有赔偿金一项,把“赔偿”两字舍去是很不诚意的做法,并且就中国劳工对日索赔都在日本法院立案提出质疑,主张中国劳工可以在本国提起对日民间索赔。

民间赔偿问题的结与解

日本侵略亚洲的赔偿运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韩国劳工最先发起,至今日本战后赔偿案件达60余件,其中原告总数达1027人。民间赔偿主要包括劳工赔偿、原子弹受害者赔偿、“慰安妇”赔偿、细菌战赔偿等方面。日本政府作为被告的案件有35件,上诉案件绝大部分是以败诉告终。没有败诉的案件屈指可数,惟有2001年韩国原子弹受害者要求与日本人有同样接受健康补助的权利,在大阪高等法院胜诉。赔偿运动的主要方式有:起诉、庭内和解、庭外和解等。在达成和解的所有赔偿案中,和解的对象只是日本的部分企业,日本政府还从未跟原告和解。日前在赔偿中主要碰到的问题是时效问题、国家无答责问题和受害者要求个人赔偿的主体资格问题。前两个问题已有突破,最后一个问题一直存在颇多争议。不过与会代表基本上能达成一个共识,即都希望日本政府尽早立法,明确战争责任,并且援用国际和解惯例等推进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同时,王选、王工等中方人士还注意到导致民间索赔失败的另一原因,即国内对日本相关法律不够了解,尤其是民间对日本更不了解,很多人连索赔程序都不明确。中国提出战后民间赔偿实际上晚于其他国家近十年,中国政府和民间人士都应积极思考如何去弥补、缩短差距等问题。在赔偿问题的认识上,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提出战争遗留问题,本质是中国人民的道德诉求,建议充分考虑文化因子的作用。比较而言,“慰安妇”索赔案相对滞后,本次大会着意为“慰安妇”代表安排了大量的发言时间,使得“慰安妇”索赔案格外受到重视。

为取得对日战争索赔的实质性进展,使日本政府公开谢罪,与会代表建言:1、亚洲各国的受害者应联合起来,发起多国家

多民族各种各样的运动。2、争取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ILO及其它国际机关的支持,以劝告和决议方式支持战争赔偿事业。3、受害国政府和议会应联合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4、受害国、国际机关与日本国内运动联合起来开展跨国运动斗争形式。以1992年提出民间索赔“世纪提案”著称的王工律师从国际同类赔偿案例的解决出发,主张日本应以其“二战盟友”德国为师,实行“官民并举的和解”,建立日本式“记忆·责任·未来”基金,与中国民间协商,谋求政治和解。尽管日本自民党、社会党等参与运作的“国民基金”于1995年开始运行。但截止到目前,“国民基金”赔偿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受害者共285人,金额仅为57000万日元,且已陷于停顿。

历史教育任重而道远

在这次会议上,有不少专家提出要重视对年轻一代的历史观教育问题。当代对待日本侵略亚洲、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的认识,要力图从教育年轻一代出发,对中国、日本及其它亚洲国家的下一代进行战

争教育。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历史教科书进行教育。日本国作为侵略亚洲的元凶,近年国内极右势力猖獗,大肆篡改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日本侵略中国及亚洲方面的内容。中国及各亚洲受害国对此极其愤慨,纷纷谴责日本右翼分子的这种丑恶行为。会议上有专家指出,日本青年一代中,有30%以上的人对过去战争认识有错误。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与德国、意大利两个国家不同的是,日本的战争教育强调日本是一个“受害国”,从而否定了侵略战争的责任。为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历史真相,代表们建议,要把“慰安妇”问题、毒气弹问题及强征劳工问题等内容写进各国的历史教科书,教育青年一代正确认识历史的真相。现在正在编写的中、韩、日三国共同的历史读本,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专家们强调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网络方法。为此,已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建立专门的网站,对青少年开展历史教育,“918”网就是一个典型。据该网站宣传人员称,中国“918”网站成立于2000年3月24日,因“大坂事件”而建立,着重宣传历史,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同时它又是一个民间的、业余制作维护的网站联盟。网站宗旨:不忘民族屈辱、反思历史教训、探讨强国之路、凝聚中华精神、增进民族了解、倡导人类和平。针对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受改革开放后各种新思潮的影响而出现对历史淡漠的现象,可以利用年轻人追求新的时尚,追求先进的网络方式进行交流沟通特点,利用网络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手段将是一个新的突破。网络教育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借助新的网络工具,对日本侵略中国及亚洲战争历史问题的认识和教育必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对战争遗迹的保护利用问题,在中国已经有多处抗日战争纪念馆及日军暴行陈列馆。这次会议上,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李兢芬女士和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等,集体倡议保护好四行仓库,在上海日军慰安所遗址(如东宝兴路“大一沙龙”遗址或浦东钱仓街)设立纪念馆,并以此作为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基地。

编辑:一凡



图为苏智良教授在大会上发言。

汤建国 摄